

## 第六章 結論

中日兩國有著一衣帶水的地緣關係，這讓彼此的發展都離不開對方，加上雙方都是深具影響力的大國，雙邊關係的穩定或變動，都將牽動整個區域甚至整個世界。冷戰結束後，中國在經濟上以驚人之姿快速壯大，進而帶動綜合國力往上提升，呈現給世人一幅中國崛起的面貌；日本則藉由在國際上爭取更重要的地位，來試圖恢復其民族自信心，走向「正常國家」。在這樣的態勢之下，中日關係勢必面臨更多的挑戰，筆者認為儘管雙方之間存在許多爭議，內在問題與外在問題交互影響，但若是要開啓雙方的對話，則勢必要在內在問題上有所作為。

### 一、研究回顧

根據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目的，本論文已藉由各章節加以論述過，這邊將分別針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正常國家」，以及兩者交織下的中日關係來做一個總體性的回顧。

首先，中國崛起是一個現象。中國崛起代表著中國自 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對於經濟發展之重視所得到的甜美果實，隨之而來的是其他領域也藉著這股力量順勢向上提升，使得中國的整體國力在 90 年代之後得到快速的增長，因而呈現的一幅圖像。

中國崛起主要則表現在三個面向之上，即經濟、外交，和軍事。經濟可說是一切之根本，有許多專家學者預測，中國可能在 20 年內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 2 大經濟體，並且可能在 2020 至 2030 年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對中國而言，外交常是內政的延伸，在中國崛起之下的外交似乎也無法跳脫，仍服膺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努力尋求穩定及和平的國際及周邊環境；軍隊在中國眼中，是總體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來保護經濟成果。

國際社會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崛起這股現象感到不安，簡單來說可分為兩點，一是中國仍由共產黨所主政，與西方主流的民主政治體制相去甚遠，造成彼此難以相互理解；一是中國的綜合國力逐漸茁壯，頗有成為區域強權並挑戰國際秩序的架勢。由於這些因素，使得「中國威脅論」甚至「中國崩潰論」等論調，也伴隨著中國崛起的現象而出現。

面對這些接踵而來的國際質疑及撻伐，中國領導人也苦思對應的方法。先是有江澤民所提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作為核心觀念的「新安全觀」，接下來在胡錦濤接掌大位之後，也召集國內各領域學者專家共同商討，最後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隨後發展成為「和平發展」，近來又有「和諧世界」這個新詞彙的產生。這些概念所要表達的意思其實相當類似，目的都是為了要讓國際社會瞭解，中國是以和平之姿來展現其崛起的面貌。

其次，日本的「正常國家」是尋求恢復民族自信的途徑。由於二次大戰戰敗的結果，使得日本在美國所一手主導的憲法的限制下，成為一個所謂「非正常」的國家。由於戰後日本經濟復甦的速度極快，成為了全球性的經濟大國，在這股浪潮底下，對於日本國際地位不滿的聲音慢慢變大，追求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的政治地位的呼聲以及需求，也逐漸在日本擴散開來，就在這種氛圍之下而發展出了「正常國家」的概念。

「正常國家」發展的歷程，起初可由 80 年代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做為代表，他在上任首相之後提出了「政治大國」的口號，認為二戰後日本的政治具有濃厚的經濟味，國民的情感也始終在經濟上面打轉。在國際政經多邊關係中，日本必須適應情勢，增加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因此，這種不均衡的狀態需要有所改變。這股「政治國家主義」到了 80 年代末發展到最高峰，可由石原慎太郎及盛田昭夫，在 1989 年合著的「可以說不的日本」為代表。

正式提出「正常國家」(普通の国) 這個名詞的是小澤一郎，然而這個政治理念並非小澤一郎所獨有，而是日本保守政治家共同的思想。他在「日本改造計畫」書中指出，長期以來經濟優先於政治的情況，導致了日本在政治上與「正常國家」漸行漸遠，要成為「正常國家」必須提升日本的國際貢獻。新首相安倍晉三也針對「正常國家」提出他的看法，他要讓社會再現「日本精神」，並且在國際社會找回日本人的自信，依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表達自己的主張，能夠恰如其份的扮演國際政治上的角色。

日本在「正常國家」的作法上，主要透過聯合國外交、修改憲法以及防衛政策等三個方面來進行。除了日本追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符合其國際地位之外，其他方面看似獨立，但其實相互牽引，最終的箭頭都會指向修改憲法上頭，因為日本「非正常」狀態的源頭，就是和平憲法這個緊箍咒。雖然修憲的呼聲很高，但是修憲的難度高，加上若真的成功修憲，恐將引起排山倒海而來的抗議聲浪，於是日本便將念頭轉到防衛政策的改變上，藉由外圍立法的方式來繞過憲法，以減低抗議聲浪。

最後，在中國崛起以及日本「正常國家」的交互影響下，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呈現出來的是競爭大於合作的畫面。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反應與西方國家是相當類似的，由於特別關注中國的軍費支出，以及軍事現代化的發展，因此認為中國對區域或對日本都是具有威脅性的；中國對於日本的「正常國家」也是充滿著疑慮，認為日本的種種作為都顯示出走向軍事大國的企圖，甚至有軍國主義復甦的可能性。

在這樣互有疑慮且互不信任的狀況下，最容易引發的爭議就是存在於中日之間的內在歷史問題。日本對於引發二戰的後果，已經多次表達後悔及反省的態度，但總是被中國質疑沒有誠意，因為包括修改歷史教科書，以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在中國眼中，日本就是沒有從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得到教訓。歷史的爭議固然可以像中日建交時關係友好一樣，將其擱置處理，但是冷戰結束後中日

外在問題逐漸浮現，例如美日同盟，以及能源及領土爭議等問題，都讓雙方的關係面臨新的挑戰。

美日同盟的關鍵之一在於美國的亞太戰略。美國從 George H. W. Bush 時期開始的「扇形」戰略，到 Clinton 時期由 Joseph Nye 所主導的「東亞戰略報告」，再到 George W. Bush 為因應反恐而施行的全球戰略。這些戰略所表現出來的，都是試圖藉由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來主導亞太局勢。另一個關鍵在於日本，由於日本「正常國家」的目標，使得其也十分樂於與美國來配合，藉此增強其防衛及軍事力量。

這些作法自然被中國視為威脅所在，中國認為美日同盟屬於冷戰時期的產物，目的在於圍堵蘇聯，冷戰結束後自然也應隨著消失。雖然冷戰結束初期中國對美日同盟的態度並不嚴厲，因為其認為這有防止日本成為軍事大國的「瓶塞」作用。但伴隨著美日同盟的不斷強化，中國逐漸體會到並不是這麼回事，美日同盟似乎是朝著中國而來，甚至這個「瓶塞」也有變成「蛋殼」的可能，反而使日本的軍事力量更加壯大，中國對此感到十分不滿。

## 二、展望未來中日關係

由於地緣鄰近的緣故，發展雙邊關係是中日兩國政府必須去做的事情，而就本論文的分析來看，中日關係的未來的確充滿著競爭與潛在的衝突，有關中國威脅或是日本威脅的議論與想法，反應出來的是兩國相互認識過程中所形成的矛盾情結。但也不能如此武斷的否定中日之間沒有合作的空間，因為兩國的經貿關係自冷戰後就發展得十分迅速，是否能夠藉由經濟上的熱絡來溶解政治上的冰凍關係，都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日本學者小島朋之就認為中國不僅是東亞的軍事大國，也是影響當前東亞地區安定與發展的地區大國。中國軍事力的增強、以及國力增強後對地區自主性主導權的確立，將使中國成為霸權（hegemonic power）；然而，若中國經濟持續發

展，並且自覺應對地區的安定與發展做出貢獻，將成爲負責任的大國（responsible power），這便有利於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許多專家學者也曾對中日關係的未來提出建言，有人認爲美日不應該以美日同盟來交往中國，因爲同盟關係的核心就是以對抗作爲出發點，而應該以各自的中國政策與中國交往；也有人認爲應該加強美日同盟的機制，並且讓美日之間的中國政策更加同步，再利用美日同盟這個機制來增加與中國的對話；還有人認爲中日兩國可以藉由現有的多邊對話機制來化解歧見，增加瞭解及互信；最後有人認爲可以在東北亞設立新的多邊機制，以解決現有多邊對話機制無法充分照顧到中日雙方以及東北亞地區。

此外，中國所提出的「和諧世界」，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美麗國家」，是否能讓夠讓雙方出現緩和的契機，亦或是讓兩邊更加水火不容，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就近來的發展而言，至少中日雙方已經讓中斷 5 年多的領袖互訪再度開啓，這象徵著中日彼此都沒有讓雙邊關係再壞下去的空間，因此才能在互有妥協下讓安倍晉三達成這次出訪。

這是否意味著兩國關係能夠就此改善，恐怕也是很難肯定的，因爲存在於彼此之間的內在以及外在層面的問題，並沒有就此達成解決。出訪的意義在於修補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意參拜靖國神社而造成的中日關係僵局，目的是不讓雙邊關係繼續壞下去，進而影響到兩國在經貿上的共同利益。

總之，當前的中日關係呈現的是雙方互信不足、卻又必須在某些議題上合作，兩國間充滿矛盾且不一致的現象，外交關係起起伏伏，政治及經濟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呈現膠著情況，這都將使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仍然難脫既合作又競爭的格局。因爲要解決中日內在的歷史問題相當困難，關鍵在於雙方要能夠冷靜的處理國內民族主義的問題，避免其一再受到刺激而發酵。而觀察冷戰結束後中日關係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由於國家利益的不同，要追求一個全面友好的雙邊關係

是相當困難，甚至是緣木求魚的。重點應該是在於讓彼此增加互信，進而能夠在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中相互合作，這也就是為何安倍晉三要提出「政經分離」原則，因為要避免政治的紛爭影響到經濟的利益。